

《李商隐参加科举考试始末考》补证

毕宝魁

科举考试是封建文人出处之大节,李商隐研究专著论文甚多,成果斐然。然而其参加科举考试之始末的情况却含混不清。笔者曾专门考证探讨这一问题,并撰写《李商隐参加科举考试始末考》,在《文献》1998年第2期上发表。但文中没有较系统地交待前人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情况,对一些论据未能深入展开论析,不能给人以清晰的印象。近日重读李商隐诗文,又发现一些极其重要的内证,使原文的结论更加坚实。在近日召开的“中国李商隐研究会第五届年会”上,本项研究成果得到原会长刘学锴先生及其他同人的充分肯定。为使这一问题更加明确,故撰此文对原文进行一些补证和补充说明。

关于此问题,以往未见专论,只是在各种年谱和诗文注释中散见,意见不一,较有代表性者有以下几说。

张采田《玉溪生年谱会笺》卷一(太和六年条):

是年,义山应举,为贾餗所斥,旋从楚太原幕。

同时,张采田还认为:

义山应举,始于太和二年。太和二年至六年,正得五年。

下云“居五年间”,则统计太和六年至开成元年也。^①

岑仲勉《玉溪生年谱会笺平质》中对张采田之说进行驳斥,并将李商隐参加科举考试之始末列表如下:

太和七年乡贡，知举贾餗，不取。

太和八年病，不试，知举李汉。

太和九年乡贡，知举崔郾，不取。

开成元年无明文，当是府试已不取，知举高锴。

开成二年乡贡，知举高锴，登第。^②

刘学锴、余恕诚《李商隐诗歌集解》所附《李商隐年表》认为李商隐参加科考始于太和七年。^③《三李诗鉴赏辞典》所附《李商隐年表》^④出自刘学锴之手，同前说。其观点与岑仲勉说基本一致。

叶葱奇《李商隐诗集疏注·年谱》也将李商隐参加科考起始时间定在太和七年。其说与岑仲勉亦基本一致。^⑤

综上所述，前此关于这一问题以岑仲勉先生说为最详细，影响亦最大，如不参照李商隐其他诗文，似很严密，总体看并不错，从太和七年到开成二年间李商隐参加科考之情况确实如此。然笔者认为尚有未妥之处，即李商隐参加科考决不始于太和七年，因此其“为进士者五年”的“五年”也不是前后经历五年时间之意，而是五进考场，即“五次”之意。关于李商隐参加科举的起始时间，张采田之说失之过早，岑仲勉之说则失之晚，今特提出己见以就教于方家。

先说“张采田之说失之过早”。李商隐在《上崔华州书》中有一段话，是我们研究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。只要我们把这段话的意思全部搞清楚，这一问题就可以解决。这段话是：“凡为进士者五年，始为故贾相国所憎。明年病，不试。又明年，复为今崔宣州所不取。”^⑥“始为故贾相国所憎”，说明他最开始考进士时是“故贾相国”（即贾餗）为主考官。而贾餗知贡举是在太和五年、六年、七年这三年。李商隐参加进士考试之始必在这三年之间无疑。在此之前的太和三年、四年的知贡举是萧浣而不是贾餗。太和二年的知贡举是崔郾，如果李商隐在太和二年开始参加科举，则应说：“始为崔郾所憎”而不是“故贾相国”。仅此一点，便可说明

李商隐参加科举最早是在太和五年。

再说“岑仲勉之说则失之晚”。李商隐参加科举考试肯定在太和七年之前，关于这一点，前文提出一条外证和两条内证。先说外证：《旧唐书·文苑传》李商隐：“（令狐）楚镇天平、汴州，从为巡官，岁给资装，令随计上都。”^⑦《新唐书·文艺传》李商隐：“（令狐）楚徙天平、宣武，皆表署巡官，岁具资装，使随计。”^⑧令狐楚是从太和三年十一月至太和六年二月任天平军节度，郓、曹、濮观察使。令狐楚初次荐举李商隐为贡生，一定在这段时间。那么，最迟也是在太和六年。况且，“岁给资装”和“岁具资装”的两个“岁”字皆是状语，都是每年的意思，从这一点体会，令狐楚在此期间送李商隐参加科举也不是一次。那么，在此以前就只能太和五年和六年了。两条内证一是在《与陶居士书》中有“故自太和七年后，虽尚应举……不复作文”之语；二是在太和八年所写的《上郑州萧给事状》（《樊南文集补编》卷七）中有“倏忽三载，遭迴一名”一语（详见前文）。都说明李商隐最迟在太和六年已参加进士考试了。

最近发现一条新的内证，因前文没有提到，故稍加详析。李商隐在《上令狐相公状一》中说：

太原风景恬和，水土深厚，伏计调护，常保和平。……轩车才临，岁月未几，旱云藏燎于天末，甘泽流膏于地中。……自叨从岁贡，求试春官，前达开怀，后来慕义，不有所自，安得及兹？然犹摧颓不迁，拔刺未化，仰尘裁鉴，有负吹嘘。^⑨

令狐楚于太和六年二月出任太原尹、北都留守、河东节度使等职。从“轩车才临，岁月未几”几句可知此文写于当年，即太和六年。从“自叨从岁贡，求试春官，前达开怀，后来慕义，不有所自，安得及兹”几句可知其在此之前李商隐已蒙令狐楚擢拔为贡生，并参加过科举考试，且颇受时人重视。从这段文字推断，李商隐在太和六年以前已经参加过考试，不容置疑。而且仔细品味“自叨从岁贡”几句话，李商隐参加进士考试还不是一年，即太和六年

并不是首次参加考试。

行文至此，将主要观点归纳一下，以清眉目：因有“始为故贾相国所憎”一语，李商隐科举之始便不会早于太和五年；因有“故自太和七年后，虽尚应举……不复作文。”这句话，可知其考进士不始于太和七年。又太和八年所云之“倏忽三载，遭迴一名”更有力地说明这一问题。因太和八年未考，故“倏忽三载，遭迴一名”的“三载”只能是指太和五、六、七这三年，别无他解。太和六年所云“自叨从岁贡，求试春官”亦证明其在六年前已参加过科举。而其太和八年因病未考，开成元年因故未考，亦为学术界所公认，那么，其“为进士者五年”便一定是太和五年、六年、七年、九年和开成二年了。如果以太和六年为起始年，那么，算经历时间则是六年，算进考场之年则是四年，都不是五年。故只有太和五年亦参加考试，才能对这句话解释清楚，而且与一切内证和外证全部吻合。

结论：李商隐在太和五年、六年、七年、九年、开成二年五年里参加了进士考试，开成二年登第。

注：

- ①见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63 年版 28 页。
- ②见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 1963 年版 224 页。
- ③见中华书局 1988 年版 2065 页。
- ④见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2 年版 1273 页。
- ⑤见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5 年 11 月版 799 页。
- ⑥见《樊南文集》卷八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 441 页。
- ⑦见上海古籍出版社、上海书店《二十五史》第 5 册 4086 页。
- ⑧见上海古籍出版社、上海书店《二十五史》第 6 册 4744 页。
- ⑨见《樊南文集补编》卷五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 648 页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辽宁大学中文系